考古学的文化观

陈胜前

关键词: 考古学文化 考古学理论 史前时代

KEY WORDS: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archaeological theories prehistoric times

ABSTRACT: Archaeology takes culture as its research object. However, as the cultures various archaeological schools of the present-day world study are different in connotation, it is difficult to get mutual understanding in their exchanges. By tracing the historical source of the archaeological concept of culture, sorting out the divergences of different archaeological schools´ concepts of culture and re-thinking the problems before Chinese archaeology´s concept of culture, it can be realized that every archaeological concept of culture has its most appropriate field, beyond which its function is progressively decreased. Therefore archaeologists should practice unceasing criticism and research so as to seek new theories and new approaches for solving problems still more effectively.

人是有文化的动物, 与动物简单的行为模式不同, 文化呈现出来的形态要复杂得多, 研究的角度也多种多样, 这就导致了文化内涵的多义性。虽然不同的考古学者都认为自己是在研究人类的文化, 但是此学者所谓的文化往往与彼学者所谓的文化不同, 因此在学术争论中往往是各说各话, 彼此难以沟通。文化作为考古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深刻的变化, 不同考古学派立足于不同的文化观上。在这种情况下, 了解不同考古学派的文化观是非常必要的, 它无疑是互相理解的基础, 而目前有关这个方面的概念梳理工作还比较缺乏, 这也就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一、考古学文化观的形成

考古学文化观的形成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从文艺复兴时代古物学的出现, 到 18 世纪末叶从北欧兴起的科学古物学, 再到 19 世纪以田野考古学为特征的近代考古学的形成, 考古器物与遗迹的发现不断增加, 人们对于史前的知识也不断丰富, 但是一直到 20 世纪初, 考古学家对于考古材料的研究还不是系统的, 考古学家缺乏一个合适的理论工具把众多的考古材料统合起来, 所以他们也无法把众多的考古材料整合在一个具有时间与空间特征的历史框架中, 解决人们试图了解过去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的问题。

德国考古学家科西纳(Gustaf Kossina) 是第一个运用考古学文化来整理考古材料的学者。1911 年, 他出版了《德国人的起源》一书, 认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就可以运用“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了; 考古学文化不可避免地反映民族性, 考古学文化的传统也就意味着民族传统[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作者: 陈胜前, 长春市, 130012,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科西纳是一个典型的种族优越论者,他试图通过考古学文化的整理寻找德意志民族的起源,他的预设(assumption)是将考古学文化与民族性等同。从古代实物遗存特征上试图区分不同民族文化传统,这无疑是靠不住的,但是他的这个理论预设促使他竭力寻找古代实物遗存在时空上的分布特征。

真正系统地运用考古学文化重建欧洲史前历史框架的人是柴尔德。1925年,他出版的《欧洲文明的曙光》(*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一书被认为是史前考古学的新起点,自此所有的欧洲考古学家有了研究工具[2]。毫无疑问,他的研究是建立在欧洲近代考古学形成以来在各个博物馆、研究所、大学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的考古材料基础之上,同时与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整体观(历史是不可分割的互相联系的整体)和唯物史观分不开(他早年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是在欧洲而不是在其他地区、为什么是柴尔德而不是其他人建立起考古学文化在考古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

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可谓是应时而生,实际上在此之前考古学家早已运用文化这个来自于民族学的概念,但是当考古学家简单地把考古材料归属于民族学上的文化时,很快就出了问题,其中缺少太多的中间环节,缺乏基本的逻辑合理性。迄今为止,考古学家依旧在努力缀合必要的中间环节。

二、考古学文化观的分化

(一)文化历史考古学的文化观

20世纪60年代,新考古学兴起,70年代末,后过程考古学出现,文化历史考古学并没有完全被取代,只是范围有所缩小。在一些史前文化历史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还在探索民族起源历史的地区,文化历史考古学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文化历史考古学中,考古学文化作为一个理论工具,其中存在着两个预设:一是以实物材料为特征的考古遗存就是划分不同文化的标准,也就是说它们代表了人们头脑中不同的思想、社会组织、经济方式或者仅仅是不同的行为习惯;二是这些标准就能够定义一个文化,或者说代表一个"人们共同体"[3]。这两个预设都是没有经过检验的,一个考古学文化只能说是一组有共同时空特征的遗存特征组合,它是考古学家对实际存在的考古遗存现象的归纳。我们经常从语言、族属、血缘关系、心理认同、生态地域、经济方式、思想传统等角度来划分社会群体,考古学文化与以这些方式进行区分的人类社会难以准确对应。

考古学文化的划定是基于考古遗存特征的相似性,然而我们知道史前人类活动产生的物质遗存并不都是相同的,而是充满差异。早在1939年,汤姆森(D. F. Thomson)就认识到澳大利亚土著不同季节不同的生计活动比如狩猎、捕鱼、采集坚果等留下的遗存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按照相似性的原则进行划分,就会形成数个考古学文化[4]。20世纪70年代初,宾福德(Binford)对努那缪提(Nunamiut)爱斯基摩人的民族考古学研究更加系统地证明狩猎采集者的遗存不仅仅存在时间上的差异,一群狩猎采集者往往根据实际资源条件利用不同的空间,这些不同功能的空间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5];与此同时,在一个生活居址的内部,还存在着功能空间上的差别,比如垃圾抛弃带的器物组成就不同于室内活动区。假定这个群体所有的实物都遗留下来而且被我们发现,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考古学文化应该包括众多具有不同遗存特征、而不是具有相同或相似特征的遗址。再者,当同一区域为不同群体使用后,由于相同的资源条件导致类似的遗址功能,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相似的考古遗存,我们很容易将之归为一个考古学文化或者一个文化传统,实际上它们分属不同的群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体。

考古学家还经常假定他们发现的考古遗存能够直接反映古人在这个区域的活动，而没有考虑古人对遗存的选择性废弃过程，古人决定离开的速度与是否返回的预期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一些遗存的有无、完好程度[6]；考古遗存形成之后还会受到人为与自然的干扰，比如古人可能会循环使用已废弃遗址中的某些材料，特别是石料。这样的话，基于相似性的考古学文化划分就面临一种困难的局面，属于同一人群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因为不同的遗存废弃过程而不一样。

“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的意义在于它能统合遗存在时空上的共同属性，解决了考古材料在广大地域范围的分布特征，让考古学家能够对似一盘散沙的考古材料进行综合研究。但是它只是考古学家为了满足一个时期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分析工具，它应时而生，也因为任务需要的变化而改变。

（二）功能主义与过程考古学的文化观

如果考古学家将研究目标限定在重建史前文化历史框架、了解史前物质文化、描述而不是解释变化方面，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或许是足够用的。但是考古学还在发展，人们还想了解更多的东西，尤其是史前人们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经历怎样的发展过程？再比如说，为什么农业只在某些地区起源，而没有在其他地区起源？为什么后来农业起源中心的周边地区有些又采用了农业，而有些地区坚决拒绝农业？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能够提供的帮助有限。

20世纪30年代，柴尔德已经意识到考古学文化这个工具作用的有限性，他开始利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史前社会的变化；4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格拉汉姆·克拉克（Grahame Clark）通过运用严格的考古发掘与发展考古科学开创了考古学的古经济学研究[7]。克拉克所谓的文化不同于文化历史考古学所指的考古学文化，而是一种具有适应与生态意义的文化，这种文化观在过程考古学中得到明确的阐述，也就是宾福德所说的：文化是人类外在的适应手段[8]。过程考古学的文化观扎根于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的文化生态学与怀特（Leslie White）的文化进化论[9]。与考古学文化作为区分群体的标准不同，过程考古学所说的文化是功能性的，是人应付外在环境变化与资源条件差异的方法与策略。

于是，在这个概念框架中，我们要研究的是文化的发展过程，解释文化变化的原因与机制。与之相应，考古学家的研究对象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再局限于遗物与遗迹的形制特征（form），而开始注意功能（function）与过程（process）。所以他们不断引入科学技术手段来确定器物的功能、遗址居留的时间长度与季节、遗址周边的资源分布状况等，他们发展民族考古学与实验考古学等“中程研究”来协助考古学家了解考古遗存的形成过程，他们还努力建立考古学理论，寻求文化发展的规律，这是过程考古学或者说新考古学所研究的文化。显然，它不同于在文化历史框架中的考古学文化。过程考古学是把文化放在进化论与生态学的背景中研究，文化在生态系统中与众多的要素（或称子系统）相互关联，呈现出多样的发展路径（多线进化）。这里所说的文化范围可以很大，大到区域的研究；也可以很小，只研究某个遗址。它可能包括若干的考古学文化，也可能是某个考古学文化的一部分。有时它甚至能与一个考古学文化相对应，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考古学文化在其分布区域中往往代表的不只是一种适应方式。最根本的问题还不在于此，以考古学文化为中心的研究关注文化谱系的建立，只收集与之相关的考古材料，而很少收集有关文化适应的材料。以分类描述为中心写成的考古报告用于研究文化生态、文化适应变迁的时候，常常会让人感到信息缺乏。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三) 后过程考古学的文化观

后过程考古学的文化观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作为文本的文化。一般来说,考古学家的任务就是要读懂考古遗存中保存的信息,然后通过它理解人类的过去。后过程考古学家把他们的研究对象视为“文本”。虽然后过程考古学家经常阅读福柯、哈贝马斯、布迪厄等哲学家的著作,但是从与考古学的关系紧密程度上来看,哲学释义学对他们的影响要更深远。按照哲学释义学的理论,懂得材料本身的意义要比材料本身重要。释义学的鼻祖施莱尔马赫提出,一个解释者如果有足够的历史知识和语言学知识,他就可以比作者更好地理解读者[10]。考古学家就是这样一个解释者。如果文化是文本,就需要了解文化的构成,从文化的历史过程来理解文化的形成过程。二是作为行动的文化。人不是机器,文化也不是镜子。人对外在的客观条件主要通过文化来反应,但人不是被动的,人有主观能动性,他们不是只有一种选择,人可以选择他们的行为,这就是带有主观能动性的行动(action),而不是一味应对外在条件变化的活动(activity)。按“释义学之父”狄尔泰的说法,人的世界是自由和创造的世界,在人文科学研究领域他建议用“理解”来代替自然科学的因果解说方法,要“从里面来理解”,通过“重新体验”来理解促使一个行动者或一群行动者去行动的内在理性[11]。后过程考古学强调利用这种方法。

过程考古学把文化视为人适应外在世界的手段,因此它强调环境的外在约束,强调生态的过程,确信经验世界的客观性,它的文化观是唯物的;相反,后过程考古学的文化观把材料视为需要重新释义的文本,本身就是带有理论的(theory-laden),没有客观性存在,环境约束还是要通过思想起作用,真正阻碍文化变化的是社会传统,因此后过程考古学的文化观是唯心的。

后过程考古学家认为人利用文化改造环境、改造人的体质、改造人的社会或者说人以之创造自我。人不是系统的奴婢,不是结构的依附者,不是为规律所决定的因子。与之相应,后过程考古学家侧重研究文化的意义(meaning)。打个比方,现在有一群人坐在一起喝咖啡,然后他们留下杯子走了。研究文化史的考古学家过来后,他们会特别关注器物组合特征,研究它们的时空属性,它们究竟属于什么时代,与周边地区相比它们有什么特点。过程考古学家过来后,他们特别关注整个遗存的分布,究竟这里发生了什么?他们会做杯子的残留物分析、杯子的来源地分析及器物分布的空间分析等,他们要解释这些遗存是怎么废弃的、怎么保存下来的及喝咖啡的功能(是生理需要还是社会需要)等。而后过程考古学家更关心喝咖啡这个活动的意义,它在当时象征着什么、它与当时社会哪些活动有关、它能说明什么样的社会问题等。不难看出,这三种研究关注的方面不一样,虽然它们都以文化作为研究对象。无疑,这三种研究都是我们所需要的,文化史的研究往往是基础,过程考古学的研究是一次拓展,后过程考古学的研究是再次拓展。

三、反思当代中国考古学的文化观

考古学文化无疑是当代中国考古学最核心的概念与理论工具,从1959年夏鼐开始倡导运用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整理中国的考古学材料[12],到苏秉琦提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分析[13],中国考古学对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的运用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14]。考古学文化在重建中国史前历史的时空框架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且无可替代。

当然,中国考古学在如何判定考古学文化上还存在一些误区。从整体上来说,旧石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器时代是否适合运用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 比如许家窑文化、大窑文化, 它们与经典的考古学文化定义并不契合, 代表这些文化的只有一个遗址, 如果这些文化成立的话, 也就是说每个遗址都应该是一个考古学文化, 尽管这些遗址可能包含有时间跨度极大的几个层位。因此, 在旧石器时代, 尤其是对早中期的考古遗存而言, 用石器组合或者工业来统合考古材料要更合适一些。

考古学文化具有时空特征, 跨度极长极大的划分, 比如彩陶文化、细石器文化, 我们已经知道它们是不合适的, 然而究竟多大合适?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选定遗存组合特征, 以现在还有人在使用的"细石器文化"而论, 它主要指用间接打制技术生产两边平行的细小石叶为主的考古遗存, 要确定它的遗存组合特征很困难, 实际上与细石叶、细石核共存的还有许多大型石核工具和更多的石片工具, 细石核、细石叶只是所有器物中的一小部分。它从距今 2 万多年前产生, 流行于东北亚到北美西北部极广大的地区, 最晚的使用时间已经进入历史时期, 它代表的是一种特殊的适应方式[15]。很显然, 考古学文化也不适合分析这类考古遗存。

在中国考古学中, 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在新石器时代与夏商周考古中运用最为普遍, 这两个时期的文化大多是定居文化, 遗存特征组合的时空分布相对比较稳定, 风格发展明确, 可以将之视为社会行动的单位。此外, 古史传说对这些时代有一些记载, 因此把考古学文化与族群相对应不可避免, 尤其是夏商周时期考古。然而把考古学文化这个理论工具具体化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所以需要时间、地域、经济、社会、信仰等诸多特征的对应[16]。在古史传说不大准确的新石器时代, 只能将考古学文化粗略视为社会行动单位, 而不能是传说中的族群。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 一个考古学文化代表一个社会群体是在一定条件下成立的, 它适用于定居文化, 而不大适用于高度流动的狩猎采集群体, 因为后者遗存特征的时空分布非常分散而且多样, 风格发展不明确, 很难准确划分考古学文化。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后段, 考古遗存的地域特征得到明显发展, 它们是考古学文化的雏形, 但是要在这个阶段建立考古学文化, 目前的工作还不够。而在国家文明形成之后, 社会复杂性大大加强, 不同阶级或阶层的文化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 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的运用也有局限, 所以"考古学文化" 最适用的范围是新石器时代考古, 超越了这个范围就会出问题, 中国考古学的实践也证明的确如此。

以考古学文化研究为中心难以解决的问题是解释文化的变化, 为什么一个文化会发生变化? 考古学家只能依靠传播论、迁徙论或者说是文化影响不可避免来解释, 所以在我们的考古报告中经常充斥着这样的讨论: 因为某些特征相似, 某某文化受到另外一个文化的影响。文化接触必然就会导致文化改变? 这是一个假设。把文化的变化机制当作"黑箱", 只能是权宜之计, 过程考古学在这个方面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 值得学习。

中国考古学文化观的问题固然在于存在一些未经证实的假设, 而最主要的问题则是考古学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目的论倾向: 考古学研究有最终的目标[17]。一旦有了这个固定的目标, 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必然也要围绕其运转, 与其相应, 也就有了惟一的理论基础。实际上, 从考古学的发展史来看, 考古学家的目标是不断发展的, 未来考古学的研究目标是开放的, 而不是封闭的。所有的理论都是研究的工具, 因为我们的研究目标在不断发展, 因为研究材料在不断丰富, 所以不存在不分时间空间、不分对象、永远正确的理论。就像一种药物对于治疗疾病的有效性不断衰减一样, 每一种理论的效用都是递减的。考古学文化这一理论工具在运用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初期其合理性与效率也是很高的,但是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深入与拓展,它的不合理性与低效也越来越明显。因此考古学家永远需要努力,不断发展新的理论与方法以赶上实践的步伐;而目标的有限会助长考古学家慵懒[18],目标的固定则会制约考古学家的理论创造力。

也许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中国考古学文化观会如此?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疏离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我们知道过程考古学的理论基础离不开科学哲学、文化进化论与文化生态学,而后过程考古学则离不开后现代的哲学思想。中国考古学明确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是指导理论,但是它们与考古学研究实践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显然中国考古学家没有能够架起合乎逻辑的中间层理论(middle-level theory)桥梁。为什么会如此?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问题的解决可能要回归到研究体制层面上来。一种良好的考古学研究体制应该是在国家考古(以前苏联为代表)、学术考古与民间考古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与平衡。国家考古为国家支持、服从国家意志,它可以有效地组织必要的人力、物力完成一些重大项目;学术考古主要在大学之中,它的长项在于理论与方法上的自由探索,它应该具有更大的独立性,这有助于考古学研究保持活力;民间考古活跃在体制之外,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与大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国家考古容易僵化,学术考古容易脱离实践,民间考古则容易媚俗,它们应该互相补充,避免因为单一而丧失活力。

四、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考古学文化观

(一)作为复数的文化观

前文我们已经讨论了几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观,文化观的多义性反映的是不同的审视角度,也反映文化内涵的丰富性、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与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考古学所讨论的文化是通过研究实物材料得来的,考古学家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困难也显示仅仅通过这种手段获得有关过去的信息是有限的。因此,考古学家研究文化的深度与民族学家、历史学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文化历史考古学运用"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来限定文化的内涵:只表示有时空特征的遗存组合;过程考古学则将文化简化为适应手段,可以与动物的行为相提并论;后过程考古学讨论的文化相对要复杂一些,尤其它更多考虑考古学家所在时代社会现实的状况,这样就考虑到了不同考古学家的研究出发点、所强调的文化内涵可能不同,所以文化观的多元性在后过程考古学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二)作为复数的考古学

2003年,华生(Watson)在回顾与展望近些年来美国考古学的发展时指出,美国考古学不再是一个单数,而是复数的考古学(archaeologies)了,具有各种理论与方法背景的考古学竞相登场,不仅有占主流的过程考古学,还有后过程考古学、进化考古学、性别考古学等[19]。文化历史考古学仍然还有一席之地,而后过程考古学实际上是数种考古学的统称。

从考古学的发展史来看,考古学在形成阶段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学科。旧石器时代、史前(包括原史与新石器时代)与历史考古学分别有着不同的起源过程。历史考古学与古物学的关系更密切,早期的田野发掘更多是为了搜寻艺术品,后来方法逐渐规范,其最终目的仍然是证史补史;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在于了解人类起源的过程,其理论与方法来自于生物学与地质学,比如进化论和均变论(Uniformitarianism),与一般意义上的史前考古学的理论方法来源不同。按照炊格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尔(Trigger)的说法,近代考古学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北欧的"古物学",一是英法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20]。从性质上来说,北欧古物学和流行于西南欧洲注重艺术史研究的古物学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侧重于重建完全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且考古学家汤姆森和蒙特留斯发展出完善的类型学方法,来帮助确定相对年代;瓦萨伊(Worsaae)与尼尔森(Nilsson)等运用田野发掘、多学科合作研究、民族学类比和实验考古等方法研究古代人的生活面貌,完全是一种全新意义上"古物学",也就是近代的史前考古学。

当代的考古学除了继续保持在以上三个领域的差异之外,更形成了文化历史考古学、过程考古学与后过程考古学这三种在理论方法上不同的考古学,其中过程考古学在旧石器时代考古学领域、后过程考古学在历史考古学领域、文化历史考古学在史前考古学领域各有擅长,但是这三种方法又互相竞争、互相批判,让我们看到一个异彩纷呈的局面。

(三)作为复数的我们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考古学文化观?"我们"也是一个复数。我们在运用"我们"这个词时,存在着一个未经验证的假设,即我假定别人和我持同样的观点,然而,"我们"是一个包含众多差异在内的代词,"我们"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由不同阶级、阶层、民族、国家、宗教,乃至不同地方或部门的人组成的各种群体,这些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与主张,在确定考古学研究的目的与设定考古学研究的目标的过程中有着重要影响。

回顾近代考古学形成的历史,不难发现以上所提及的因素对考古学发展的影响。在近代考古学发展的早期,西北欧的考古学家从《圣经》出发,将自身的文明视为人类文明的正裔,其他文明因为不信仰上帝而堕落。19世纪初,在殖民主义最高峰时期,殖民地考古学偏爱种族主义,把文化的差异归因于生物学特征上的区别,把文化的优越化为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到了19世纪中后期,欧洲的民族主义勃然兴起,或是如德国为了国家的统一,或是如中东欧为了反抗帝国的统治,考古学研究强调地区文化历史、强调民族的起源研究、强调地区文化的独特性[21]。

不同的"我们"造就不同的考古学。近代西方考古学是中产阶级兴起的产物[22],考古学从贵族对古物的偏好转移到对古人生活的探索,它反映的是占社会主流的中产阶级的趣味。纳粹德国的考古学强调雅利安民族的优越性,为其侵略战争服务。前苏联的考古学采用封闭的单线进化论,它反映的是一个新观念政权被敌视时对政权合法性的辩护。在20世纪中叶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高涨时期,考古学赋予民族独立性以文化依据,强调民族文化的成就与特质,与19世纪殖民地考古学家的研究迥异。当然,也有能够包括所有人在内的"我们",那就是我们都作为人类,这也就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范畴,所以这个领域的国际化程度最高。而到了历史考古学阶段,随着"我们"这个概念内涵的丰富,差异也就越来越大。

后现代的科学哲学家如费耶阿本德经常批判学术研究是学者们构建的[23],用之于考古学,那就是说考古学不过是考古学家们为了工作、为了养家糊口而人为构建起来的,"考古学"就是考古学家的考古学。这里的"我们"就是考古学家,他们垄断考古学的话语权,似乎把大众排斥在一边。实际上,当我们考察现实社会时,就会发现大众也有自己的考古学,通过现代传媒,尤其是电视和网络,考古学以一种考古学家无法控制的方式在发展。作为学术的考古学与作为大众文化的考古学,究竟谁在边缘?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考古学文化观?不同的群体、不同的考古学领域与流派、不同的文化审视角度会导致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观。是否可以有一个统一的考古学文化观?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这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因为我们不可能统一“我们”，与此同时，强行推行一个统一的考古学文化观，必然是以不同考古学文化观最佳适合度为代价的。

五、结　　论

通过对不同考古学派文化概念的梳理，我们了解到它们研究的对象与任务是有区别的。了解这种差异有助于持不同考古学文化观的学者在同一个平台上对话。21 世纪是一个复杂的世纪，并不存在一种惟一正确的考古学文化观，考古学发展史上没有，将来更不可能有。我们应该拥有多元的考古学文化观，这也符合我们这个世纪的社会背景：为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我们需要学会互相理解与尊重。

虽然不同的考古学都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然而过去的文化实际上并没有保存下来，保存下来的是以实物形式存在的考古材料，考古学必须先理解考古材料，然后才可能理解人类的过去，过程考古学擅长前者，后过程考古学强调后者，就这方面而言，它们是互补的。

在理解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观的时候，不难发现它们都植根于一个时代的思想、技术与考古实践之中。考古学家就是在理论与实践这两极之间发展、丰富中间层理论的人，缺乏理论与缺乏实践对考古学来说都是不可想像的。从唯物主义的过程考古学文化观到唯心主义的后过程考古学文化观，考古学家在两种对立的理论基础与相似的考古学田野工作之间发展出了许多的有趣研究，或认为它们是互补的关系，或认为它们是交叉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考古学家要在理论基础与实践之间创造性地架起桥梁。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每一种方法都有其最佳的适应任务，而任务往往又是时代所赋予的，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其适合度或者说是解决问题的效率就逐渐降低。我们因此不断需要更有成效的方法，这就需要我们在考古学的文化观方面不断探索，创新我们的理论工具，更好更多地解决考古学的问题。

注　　释

[1] Trigger, B. G., *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9.

[2] Daniel, G. E., *A Hundred Years of Archaeology*, Duckworth, London, 1950.

[3] Johnson, M.,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Blackwell, Oxford, 1999.

[4] Thomson, D. F., The seasonal factor in human culture, *Proceedings of the Prehistoric Society* 10: 209–221, 1939.

[5] Binford, L. R., *Nunamiut Ethnoarchaeology*,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1978.

[6] Schiffer, M. B., *Formation Processes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Salt Lake City, 1987.

[7] 同[1]。

[8] Binford, L. R., Archaeology as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iquity* 28: 217–225, 1962.

[9] Willey, G. R. and J. A. Sabloff, *A History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Freeman, San Francisco, 1980.

[10] 刘放桐等：《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 年。

[11] 同[10]。

[12] 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 年第 4 期。

[13] 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 年第 5 期。

[14] Wang Tao, Establishing the Chinese archaeological school: Su Bingqi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archaeology, *Antiquity* 71: 31–39, 1997.

[15] 陈胜前：《细石叶工艺的起源：一个理论与生态的视角》，见《考古学研究(七)》第 244~264 页，科学出版社，2008 年。

[16] 李伯谦：《考古学文化的族属问题》，见《考古学研究(七)》第 452~459 页，科学出版社，2008 年。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7] 夏鼐、王仲殊:《考古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第1~2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18] Taylor, W., A Study of Archaeology,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69, 1948.
[19] Watson, P. J., Does Americanist archaeology have a future? In: *Essential Tension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pp. 137-142,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Salt Lake City, 2003. 按照华生对1999、2000、2001年这3年美国考古学会分组会议统计,在总计576个小组中,后过程考古学仅占23个、进化考古学占11个。后过程考古学还没有成为主流。
[20] 同[1]。
[21] 同[1]。
[22] 同[1]。
[23] 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

(责任编辑 洪 石)

○信息与交流

《鹤庆象眠山墓地》简介

《鹤庆象眠山墓地》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鹤庆县文物管理所编著,文物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本书为16开本,共515页,彩色图版64页,黑白图版40页,定价380元。

2004~2005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鹤庆县文物管理所对云南省大理市鹤庆县象眠山墓地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3650平方米,共清理2367座火葬墓、310座土坑墓及1座瓮棺葬。本书对火葬墓和土坑墓的形制、葬具、葬式、随葬品、典型墓葬、分期及年代等分别进行了详细介绍。火葬墓年代从南诏晚期至明末清初,土坑墓的年代从明代中期至近代。在结语部分还对火葬习俗、具有佛教色彩的火葬形式、对于火葬的禁令及土坑墓葬俗的推广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正文后有2个附表、2个附录。此次发掘为研究云南地区的火葬习俗提供了新资料。

(叶知秋)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考古 Archaeology 2009年第10期

本期要览

江苏淮安市运河村一号战国墓　2004年，对江苏淮安市运河村一座大型竖穴土坑木椁墓进行了清理。墓室由主椁室、外藏椁及一个陪葬坑组成。此墓共有人骨12具，除墓主外，其余均为殉葬者。出土遗物有陶器、铜器、铁器、漆木器等，其中1辆实用马车，木质构件相对完备，制作精美。墓葬年代大约在战国中晚期之交，墓主可能是楚国贵族。

山东微山县微山岛汉代墓葬　2003~2005年，对山东微山县微山岛44座汉墓进行了清理。其中土坑墓15座，有单人葬和二人葬之分；石椁墓21座，有单椁、双椁、三椁之分；画像石椁墓8座，有单椁和多椁之分。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还有38块画像石。这批墓葬的年代为西汉早期至东汉早期，为研究这一时期山东地区的葬俗等提供了新资料。

河南洛阳市北魏洛阳城津阳门内大道遗址发掘简报　2005~2006年，对汉魏洛阳故城北魏内城的津阳门内大道及相关遗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道路为北魏洛阳内城西部的南北向交通干道，通过发掘明确了该道路的确切位置、时代和基本结构。出土遗物主要为建筑材料和陶瓷器。陶瓷器以青瓷器和白瓷器为主，为探索中国古代白瓷起源提供了新资料。

考古学的文化观　通过追溯考古学文化观的历史来源，梳理不同考古学派文化观在概念上的差异，有助于反思中国考古学文化观所存在的问题，并认识到每一种考古学文化观都有其最佳的适应领域，而且它们的效用都是递减的，因此考古学家必须不断批判与探索，寻求更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新理论与新方法。

周代青铜礼器的生产与流动　作为身份地位象征的青铜礼器，从铜矿的开采到器物的生产与流动，都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由此造成了在同一国家权力控制下，青铜礼器的风格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由于转让赠送工匠、联姻、　赙、战争掠夺、贿赂等流动方式的存在，形成不同风格青铜礼器共存的局面；周代青铜器制造作坊存在王室作坊和诸侯作坊等级别。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